

天津古籍出版社

魏宏运 著

契齋別錄





魏宏运、王黎夫妇漫步于南开园



“南开一号”，世之懿范

盖凡大学能彪炳于世而历久不衰者，必有悠远厚积之历史，必有淳朴诚信之学风，必有名被遐迩之教授。南开大学巍巍乎于国中垂九十年矣，追其肇创之际，即延请国内著名学者，而历史学科彼时所聘尤为国中学界之选。支撑大学之脊梁为教授，教授之道德文章则为学子之榜样，薪承火继，民族文化得以昌盛。大学水平为一国文化之标志，固非妄论。

魏宏运教授，南开大学博雅周瞻、宅心仁厚之长者也，人人尊崇之、爱戴之。其为人也，宛若春风祥霭；其言说也，咸称大朴无华。莘莘学子，欣然而聆，肃然而敬。每天清晨或黄昏，于马蹄湖畔、芝琴楼前偕夫人散步，蜷曲疏发迎风轻拂，超然之致，清绝忘尘。人们尊称此老为“南开一号”，非指其职位之高，实有故事在焉：一年南开分房，以学术地位、工作年限、职位高下诸条件反复比列推敲，前后三次分房之告文中，魏宏运先生皆名列第一，竟绝无争议者，群众皆拊掌称是。于是南开教授群谥封先生为“南开一号”并嘱我题匾，刻而赠之，悬诸堂中。静言思之，此中深情，盖非旧时之送匾额、标举炫世可与同年而语者。

博雅、和蔼而外，魏宏运以德劭年高之政治活动家，自十九岁即加入共产党外围组织之革命工作，临危不惧，艰苦奋斗；大学毕业后历任南开大学历史系党政领导，五十余年，夙兴夜寐，自有一副承受时代重负之铁肩，正所谓风高而节亮、道直以行正，为世之津梁，略无悲怨。“南开一号”四字，惟树学人懿范、立校风旗帜者当之。

魏宏运先生，临事秉公决断之大丈夫也。早在反右之时，恩师雷海宗先生为康生所嫉恨，定为极右，以魏先生之力，不可救之矣。然则彼时崇拜雷海宗者，南开大学历史系于各会议裂目而辩者何止百十，其尤者为杨志玖先生，敢于报刊为雷公鸣不平。其时国中反右旗鼓大张，魏先生则在其权力范围内，荫庇回护，谓“以中农出身之教授，国中殊少”为由，获胜于议决，杨志玖先生遂逃此一劫。庚午、辛未、壬申三载，我以家事国事忧烦，蛰居巴黎，时魏先生讲学赴法，住于我乡间别墅，先生力劝我归棹。既归，众皆寒蝉，独滕维藻校长并先生与历史系诸前辈王玉哲、杨志玖、杨翼骧，挚友刘泽华张宴以待。亦有好事者，至魏先生处，皆警无状，遭魏先生怒斥而遁，先生之性固温文尔雅，时亦强犟坚韧，于时代风云际会处，“虽千万人吾往矣”，是先生大君子之风也。余以此感激，更竭尽全力于南开大学之工作，为祖国之繁荣奉其绵力，非魏先生不能使十翼如此也。

先生于余亦有深恩在。遥记魏先生二十六岁时，任系主任助理，时江丰读余文章，欲调我于中央美院就读。我谋诸好友李群超，李群超将此意转达于魏宏运先生，魏先生又商之郑天挺先生，郑老竟颌首而许之。此余生命之转折点也，苟无魏先生彼时鼎力助我，我将与画家绝缘，不会于中国画之领域做出应有之贡献。数月之间完成转学。不幸江丰被划为右派，从此睽隔三十年，及与江丰重见，我已年届五十，握手怆然，不胜唏嘘。

先生幼年失恃，父亲为耕而食，闲而学之清贫乡儒，为人忠厚，

博览史典而精于书法，后又激于国难，英勇抗日，人品为乡曲所重。魏宏运先生以农家子刻苦自励，厥有大成，其间甘苦可知。先生由研究古代史起步，其处女作《民族英雄——史可法》即获郑天挺先生激赏。兹后魏先生专攻近现代史，著述等身，其所主编之《中国现代史》列为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先生文风素为史界所称颂，谓“资料翔实，系年清晰，去伪存真，字简事丰”。为史最忌以不实之史料，证先验之结论。先生极重实地调查，为研究八国联军侵华涂炭生灵之罪行，曾于大沽、北塘、张贵庄、大直沽等地深入探访，征之文献所载，将帝国主义凌辱中华民族之劣迹，大白于天下。又如，当日本右翼势力甚嚣尘上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史蠹笔贼，蠢蠢出动，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罪行，先生秉笔痛斥，耿耿情怀，天日可表，为后之来者毋忘国耻树立榜样。魏先生自青年奔赴革命道路，半世纪来为祖国之尊严、为时代之进步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于史乘，追陪《春秋》，笔削不假，为史界所景从。

先生谙英语，国门既开，先生播芳海外，先后十数次出国讲学，欧美诸国名大学皆延教席以待，为祖国史学争得殊荣。

先生弟子类皆慎行明辨，成为卓有成就之史学新锐，获博士学位与教授职称者累百数。桃李满目，灼灼其辉。

先生八秩之庆，将有纪念专集、自订年谱，嘱余为序，余感先生扶掖呵护之深恩，临楮感慨，不能自己，谨以此奉上心香一瓣，恭祝先生永年，九秩犹顽健如少，百龄当不为上限，余其深祷！

范 曾

甲申春于南开西南村

目 录

一、自述	1
二、中国近现代史透视	23
《中国近现代爱国主义运动史略》序	25
《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孙中山英文 藏档透视》序	26
《中国现代史教学与研究》序	28
《罗素与中国》序	30
《国民革命事典》序	31
《远见卓识——周恩来知识分子思想 研究(1949-1976)》序	33
《战国策派思潮研究》序	35
《蒋介石的幕僚》序	42
《蒋介石与国民党腐败》序	44
《蒋介石研究》序	47
《冯玉祥和他的将领们——西北军将领录》序	50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序	51
《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研究》序	53
《闽浙赣根据地的金融》序	54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 保甲制度研究》序	56
《社会的缩影——民国时期华北农村家庭研究》序	60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察绥地区》序	61

《晋绥革命根据地研究》序	64
《乡村集市与近代社会——20 世纪前 半期华北乡村集市研究》序	67
《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 乡村借贷之研究》序	69
《中国农村变革と家庭・村落・国家——华北 農村調査の記録》(第一卷)序	74
《中国农村变革と家庭・村落・国家——华北 農村調査の記録》(第二卷)序	76
《農民力語る中国現代史》序	79
《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史研究》序	81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序	85
《巍巍中条》序	86
《山西抗日战争史》序	92
《保卫滇缅路》序	98
《抗日战争时期文化思潮研究》序	100
《〈大公报〉新论:20 世纪 30 年代〈大公报〉与 中国现代化》序	102
《近代日本在中国的殖民统治》序	105
《周恩来与大国关系的变动》序	106
《中日民间经济外交》序	107
《理想・历史・现实——毛泽东与中国农村 经济之变革》序	110
《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发展史》序	112
三、谈史录	115
梁启超读书于日本的启示	117
读《清代外债史论》	124
李维格其人其事	126
中国现代史研究大有可为	131
周恩来同志的《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读后	139

内容丰富 刻意求新

——评《孙中山与中国国民革命》…………… 146

《武汉国民政府史》评介…………… 149

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新视野新方法

——岳谦厚博士《顾维钧外交思想研究》评介…………… 156

读《中国近现代政党史》有感…………… 159

读孔永松著《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演变史》…………… 161

立足史料 阐发新见

——评《中央苏区财政经济史》…………… 162

读《民国山东史》…………… 164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评介…………… 166

读《红军长征研究》…………… 168

评《抗日战争史》…………… 169

读齐武的《晋冀鲁豫边区史》一书有感…………… 170

美国学者华北农村调查的一大成果…………… 172

从 11 村个体农民生产消费看近代中国农村变迁

——评侯建新《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 174

简评《新疆近世史论稿》…………… 191

四、学术絮语…………… 195

“五四”和传统文化…………… 197

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词…………… 198

《历史教学》不寻常的 50 年…………… 200

老校长滕维藻

——心系南开…………… 204

我说范曾…………… 206

科教兴国 培养人才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题词…………… 209

《史河初涉集》序…………… 210

架起一座和民国史研究者息息相通的桥梁…………… 210

《天津党史》祝词…………… 212

《大公报》:我的良师益友	213
清新俊逸 古雅风流	215
《南开史学家论丛》第二辑序	216
五、南开忆往	219
忆解放初期的南开文学院	221
忆南开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同情小组	223
南开大学图书馆往事	225
从《穆旦诗全集》想起	227
杨石先校长风范永存	229
我看南开半个世纪	231
李何林先生一生的追求	232
毕生心血献史学	
——怀念郑天挺教授	235
郑天挺和中国现代文化教育事业	240
郑天挺的一生	244
回忆我与郑老相处的岁月	247
和雷海宗先生相处的十年	250
怀念王金鼎同志	253
大师风范 泰然一生	
——怀念黎国彬先生	256
风雨鉴真纯	
——记与吴廷璆先生共同走过的岁月	259
六、美国学旅	263
大西洋彼岸的友谊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	
——旅美校友欢聚的日子	265
蒙他拿大学任教的一年	268
哈佛大学“战时的中国”学术研讨会之我见	272

自述

锲斋别录

QIE ZHAI BIE LU



家 世

1925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十八)我生于陕西省长安县魏寨镇李窑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家有土地二三亩。祖父魏登俊,做过小生意,父辈兄弟二人,伯父魏应鹏读过私塾,酷爱书法,曾在西安做过店员,后来一直在家务农,爱讲《聊斋志异》。父亲魏应中是乡村知识分子,读过不少古书,我记得他常讲《资治通鉴》里的故事,非常熟谙,随口道来,娓娓动听,还写一手好字。父亲曾在魏寨创办第一所新式小学,自任教师。当时家里很穷,有时连吃的都没有,记得4岁那年除夕,父亲借钱买了两把挂面,这是最好的年夜饭了。从4岁起,农忙时,我就到地里去拾麦穗,拾柴禾,冬天也到地里去割枯萎的野草,我还提着小篮子,在魏镇附近各村卖过灶糖,我穿的是破破烂烂的衣服,没有鞋子,没有袜子,童年的生活挨饿受冻,是很苦的。

后来父亲被当时频繁乱抓夫现象所激怒,愤然投笔从戎,在方振武将军的军事学校接受军事训练,虽然是半路出家,枪法却很好。尔后参加了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领导的察绥抗日同盟军。由于蒋介石的破坏,长城抗战失利。1935年,他到杨虎城将军的西北军警备一旅机枪连任连长,驻防皇城,守卫钟鼓楼。1936年12月,父亲参加西安事变,积极拥护张、杨的“八项主张”。西安事变后,他奉命移防蓝田,对抗蒋介石的中央军。抗战开始后,父亲所在的部队驻扎平利县,与占领永济县的日军隔黄河对峙,1939年末开赴中条山。1941年中条山战役时他任副营长。在这次战役中,父亲的部队被打散。于是他回到家乡,后经友人介绍,任长安县自卫队队长、大队长。在此期间,他曾掩护过地下党员毛云鹏、常秉乾,并保举他们二人任自卫队中队长。父亲为人忠厚,做事公道,乐善好施,从未做过有损人民的事,有“魏善人”之称。长安解放时,父亲与胡宗南的部队斗智斗勇,周旋于终南山,率自卫队成功起义。解放后,父亲在家务农,又任长安县政协委员。他热



心农村教育事业,农闲时,在农村的识字班、扫盲班任教师。1985年因患脑溢血去世。“文革”时期,造反派说我是“三大”(即大资产阶级、大军阀、大地主)出身,纯属无稽。

生母在我两岁多时因患肺病去世,才24岁,我四五岁时常跑到她的坟上哭泣。幼年的我是靠祖母、外祖父、姨母和伯父抚养。我11岁时父亲再婚,继母是一个忠厚、善良、聪慧、善理家务的人,是西安市新房村人,虽未曾读过书,却广有见识。父亲从军常年在外,她对我疼爱有加,她把我的勤奋好学视为她做继母的光荣,在家境最艰难时,她四处借钱供我读书。后来继母生了我的妹妹和三个弟弟,对我的疼爱依然如故。外祖父家境比较富裕,因我生母早逝,他分外疼我,对我的成长花了很多心血。二舅父在抗战时期牺牲在日军的枪口下。四舅父仅长我一岁,1946年后,与我同在北平读大学,未毕业就去了解放区。解放后,长期在国家计委工作,现已离休。

读书和革命

我的家乡有一个习俗,每逢正月十五闹元宵,总要办社火。每次我都被选中,且扮相不错,所以村里人说,这么穷,没有吃的,还不如把我送到西安去学戏。可父亲却不以为然,总希望我能多读点书。1934年因父亲到杨虎城部队工作,我也随父亲到古城西安,入西安师范学院附属小学读书。我原名叫魏运新,入西师附小时,父亲托一位朋友给我报名,他这位朋友一时忘记了我的名字,临时替我起了一个“宏运”,沿用至今。

1936年12月12日早晨,我在上学去的路上,看到街上岗哨林立,行人很少,盘查甚严。我冲过几个路口,再不能前行,就返回家中。时而听到零星的枪声,我呆在家中不敢出门。第二天,我到东大街菊花园附近,看见街道两旁有许多拥护张、杨“八项主张”的标语。还有一些人在街头演讲,宣传张、杨的“八项主张”。有关西安事变的情况是后来父亲讲给我的。



西师附小有几位正直的老师,如段克立、余自修、张镜如等,都是我所敬重的人。他们主张抗日,我也渐渐有了抗日救国的思想。学校组织学生到西安郊县演讲,宣传抗日,到电台去播唱抗日歌曲。当时每个青年都有一腔热血,我也不例外,各项抗日活动我都积极参加,心中充满抗日救国的责任感。从那以后,我懂得什么是国家大事,对抗战和时局非常关心,知道报纸是必须要读的。在西师附小不远处的南院门有一家生活书店,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在那里我读到不少进步书刊。小学毕业前,我已读了许多书,有读懂的,也有读不懂的,但我坚持读下去,倒也增长了不少知识。

1939年我考入刚成立的陕西省立兴国中学,学校为了躲避日机的轰炸,把校址设在西安郊外三十多里的兴国寺。这所学校邀集了一批陕西著名学者来此任教,如在西安主办《老百姓报》和《民众导报》、后来担任延安大学校长的李敷仁先生,解放后担任陕西省博物馆馆长的武伯纶先生,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曹冷泉先生,曾任民盟山东主任委员的姜自修先生等,他们先后担任过我年级的班主任。先生们学识渊博、品德高尚,对我影响极深。从先生的身上,我学会了怎样读书和如何做人。李敷仁先生是中共地下党员,教公民课,他的课程是不考试的,要完成的作业是深入农村搜集民谣。我与他更为熟稔,是从我代销他所办的《老百姓报》和《民众导报》开始的。每周我从兴国中学去西安市内一次,取回报纸,并与李敷仁先生结清上一次的账。当时我读到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等著作就是他秘密给我的。1944年,我加入党的外围组织。

在兴国中学,我和三五个志同道合的同学晚上不回宿舍,住在教室里,几乎每晚开夜车,那时称为熬夜。熬夜看的书不是课堂上讲的,而是当时我们所能搜罗到的古今中外的文、史、哲方面的书籍,文学方面的如郭沫若的《女神》,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春》、《秋》,高尔基的《母亲》,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等;史学方面的如何幹之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等等;哲学方面的如程始仁编译的《辩证法经典著作》、日本



学者写的《辩证法入门》、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潘梓年的《逻辑学与逻辑术》等等。我们还背诵了《古文观止》、《幼学琼林》、《左传》、《四书》、《古文辞类纂》、《国父语录》之类的书。在老师们的悉心教育下,我的学习成绩很好,尤其国文、英文、历史一直是优秀。先生们说,我的作文有马克思主义思想倾向,有新意,因而我更得到他们的厚爱。我曾参加学校举行的英语讲演竞赛,在学生自治会的刊物上发表作文,有时找不到合适的题材,我就翻译一段英文,也能发表。当时我的生活很苦,每星期要走30里路回家背一次干粮,菜只有辣椒面,然而精神很愉快。这期间,曾因家庭经济条件实在困难,休学一年。1946年春,国民党在西安大肆搜捕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兴国中学的特务性组织“新世风”干了很多坏事,我也被列入“黑名单”。我躲避到毛云鹏的自卫队里才得以幸免。当时面临毕业考试,我和其他进步同学不得不东躲西藏,后来在姜自修等先生的掩护和安排下,勉强参加考试,匆匆离校。

我对历史学科感兴趣是受父亲的影响。小时候,他经常给我讲故事,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稍长,又教我读《资治通鉴》等历史书。但是把历史作为专业攻读则缘于一个偶然的機會。抗战胜利翌年,我中学毕业,恰好北平辅仁大学在西安招生。报考什么专业呢?因为仰慕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之名,就报考了辅仁大学历史系,竟然被录取了。我喜出望外,能去北平读书,足慰此生了。没有钱怎么办?父亲的朋友毛云鹏和常秉乾、三舅父及一位胞兄魏宏兴慷慨解囊,同学王井南、程福凯等也给予资助,他们去募捐,凑足了学费。我自己带着银元经河南,绕道上海,乘船北上,由塘沽到达北平。那时候兵荒马乱,旅途很不安全,父亲因为长时间没有接到我的信,还大病了一场。

来到古都北平的所见所闻令我耳目一新,眼界也随之更为开阔。辅仁大学教学质量很高,所聘教授皆学识渊博,其中余逊先生讲课从不拿讲稿,围绕所讲内容随手拈来,我从中受益匪浅。辅仁离北大红楼很近,距北平图书馆也不远,怀着强烈渴求知识的愿望,我常到这两个地方去读书。看电影、逛街我是绝对不去的。我



总想着我和别人的情况不一样,能到北平读书,对我来说太不容易,我必须加倍努力,否则就愧对于那些资助我的亲朋好友。辅仁是教会学校,西洋史由传教士胡鲁士用英文讲授。我非常喜欢英文,每学期规定修完二十多个学分,我选了16个学分的英文课,唐悦良的英语会话吸引住我。历史课仅修了4学分。我的英语能在荒废二三十年后重新拾起,于以后的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大有裨益,应该说是与在辅仁大学得到英文听、说、读、写的扎实培养分不开的。1946年到1948年,北平学生运动高涨,我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积极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等爱国运动,参加了冀热察城工部工作,加入中国共产党,宣传中共的政策,发展组织,向解放区输送干部,地下活动工作很多,我也没有放松过自己的学业。

辅仁大学是私立教会学校,要交学费,而且生活费依然没有着落。我参加过去街头募捐的活动,也到青年会办的夜校去兼课,勉强能够维持自己的最低生活,那时物价飞涨,谁都为生活发愁,我不能一味求助于亲友,就萌生了转入声望很高的国立南开大学的念头。1948年,我顺利通过考试,被录取插入二年级。那次考试能够成功,靠的仍是英语,我的试卷一律用英语回答,这大概是其他考生没有想到的竞争方法。

在南开求学时,我担任文学院学生会主席、校学生会副主席,我代表学生会参加了校委会,这对我的工作能力是很好的锻炼。在学业上,在杨生茂、吴廷璆、王玉哲、杨志玖、谢国桢、黎国彬等诸位师长的悉心教导下,自己从不敢稍有懈怠,常以打下深厚而牢固史学基础自勉。

“双肩挑”

1951年,我毕业留校在历史系任教,先后任系秘书、系主任助理,协助系主任处理日常行政事务。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教育部决定北大历史系主任郑天挺教授到南开担任历史系主任,这样学校便多次派我去沙滩红楼接洽郑先生来南开事宜。后来在